

# 罗荣桓：严抓纪律 严惩贪腐

■孟俭红

## 为将之道

罗荣桓同志曾长期从事军队政治工作，新中国成立后任原总政治部首任主任，后兼任原总干部管理部（后改称“总干部部”）部长、政治学院院长。1955年，中共中央又任命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党的监察委员会书记。罗荣桓虽然担任多个重要职务，工作繁忙，但他非常重视军队纪律工作，注重维护军队纯洁。

新中国成立初期，全军纪检监察工作由原总政治部主管。罗荣桓身体力行，亲自去抓。当时，有个别干部居功自傲、贪图享乐，甚至堕落腐败。罗荣桓在中央的一次会议上建议，要重视解决这个问题。根据他的建议，1954年8月8日，中央军委和原总政治部发出了《关于制止某些高级干部腐化堕落违法乱纪行为的指示》（下文简称《指示》）。

《指示》点名批评了一些干部的严重错误，指出这些人违法乱纪，损害了我党我军的声誉和革命事业，必须严肃处理；对那些明知故犯、屡教不改的人，不论其职位多高，必须给以纪律制裁；对那些包庇犯重大错误干部的组织和个人，也要进行查究。同时，《指示》强调，要加强党对高级干部的领导与监督，开展党委内部和高级干部之间的批评与自我批评，特别强调“腐化堕落不是生活小节，而是政治原则问题”。随后，全军对高级干部思想作风进行了一次整顿——对团以上干部进行普遍教育；对师以上干部，党委专门召开会议进行讨论；全军对犯有此类错误的干部进行揭发、批评并上报，不少人受到处分。

罗荣桓严抓纪律，严处贪腐一贯如此。当年在山东抗日根据地，八路军第

115师民运部部长翟新亚受命出任郅城抗日民主政府县长。然而，这位老八路没能坚守本心，到任后贪污受贿、玩忽职守，生活作风堕落。时任师政委的罗荣桓赴郅城查明实情后，怒不可遏：“谁骑在老百姓头上，老百姓就要起来打倒他！”翟新亚随即被撤职、开除党籍。

罗荣桓清楚，随着部队快速发展和根据地规模的扩大，领导干部中容易出现作风问题和贪腐现象，要防止类似事情再发生，必须对隐患进行整肃。于是，他组建了纪律审查组，把115师所有干部挨个“过筛子”——不管是老红军还是新提拔的，不管是在机关还是在基层，谁有违纪行为，谁作风有问题，都一一列出来，该批评的批评，该撤职的撤职，一点情面都不讲。有个连长因为借老乡粮食没还，罗荣桓直接让他停职，先去给老乡道歉、还粮食，再回来做检讨。有人说没必要这么较真，罗荣桓却说：“借东西要还，这是最基本的规矩。今天借粮食不还，明天就能贪军饷。小错不纠，早晚会出大问题。”他还定下一条铁规矩：以后部队所有物资调配、经费使用，必须登记造册；谁批的条子，什么时候发的，发给哪个单位，用在什么地方，都得一笔一笔记清楚，还要有经办人签字，出了问题能直接找到人。罗荣桓曾对身边人说：“干部出了问题，不能只怪他们自己，组织上没盯紧、没提前提醒，这也是责任。”

上世纪50年代，我军出现了忽视和削弱我军光荣传统的错误倾向，有人甚至不再提“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”。罗荣桓组织召开原总政治部务会，公开批评某些人的错误言论。在1953年底的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，原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代病重的罗荣桓作《关于军队政治工作建设的几个问题》的报告，强调我军要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、坚持

党委制、坚持军队政治工作制度，发扬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。毛泽东同志审阅了这个报告，并在会后修改《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》（草案）时，亲自恢复了“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”一语。

1955年8月1日，罗荣桓又撰写了《继续发扬我军的光荣传统》一文。文中，他明确指出：削弱我军光荣传统，是一个极端危险的倾向；我军建军原则和光荣传统是经过几十年流血斗争所取得的宝贵经验，是完全适合中国情况和我军特点的，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。

由于工作繁忙，且长期患有高血压、心绞痛，1956年，罗荣桓向中央请辞原总政治部主任和总干部部部长职务，但没有请辞党委书记一职，并且到逝世，他一直担任此职。1961年1月，中央安排罗荣桓再度出任原总政治部主任。当时，有些单位对个别高级干部违法乱纪的案件不敢处理，导致矛盾激化。针对这一问题，罗荣桓在1962年全军组织部长会议上指出：“高级干部的道德品质问题要引起注意。现在有些党委在处理腐化堕落蜕化变质问题时，缺乏严肃的原则空气，有的则是毫无原则。”他认为，对待这种问题，“经过批评斗争，改正了错误，就能够把大事化小；化，要经过工作去化，要有原则。根本不讲，根本不批评，采取包庇起来的办法是化不了的，其结果是小事酿成大事，最后甚至是不可收拾。”

罗荣桓坚持正人先正己。解放战争时期，他从莫斯科回到哈尔滨，全家被安排住进市区一处很宽敞的独立庭院。他多次向有关部门提出将这处庭院用作公用，自己另找一处房子住。一次，罗荣桓到时任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主任的谭政家里，见他家住的是二层小楼，就提出与

他合住。谭政以为是句玩笑话，但没过多久，罗荣桓一家真的搬来住了。罗荣桓对家人说：“住的房子大小，看来是不起眼的事情，但我们是党的干部，要时时想到生活在基层的人民大众，不能官做越大，住的楼越来越高。”他还说：“生活不要特殊化，一味追求舒适的生活，讲究吃穿，贪图享受，就要变坏的。”

罗荣桓不仅严格要求自己，同时严格要求家人，家风很好。抗战时期，罗荣桓与妻子林月琴结婚仅3个月就离开延安，奔赴山西。一年后，林月琴来到抗日前线，组织准备安排她担任司令部机关协理员。罗荣桓对她说：“最好不要在我领导的单位工作，这样对你的锻炼可以大些。”林月琴欣然接受。新中国成立后，罗荣桓时不时叮嘱林月琴，要经常检查有没有违反制度，有些事情尽量自己解决，不要去麻烦组织，自己能够动手做的事情，就不要让工作人员做。

罗荣桓的大女儿罗玉英，早年一直留在湖南老家，20多年没见过父亲。1949年底，她给父亲写了一封信。罗荣桓从信中看出，女儿认为父亲当了大官，可以进京享福，就回信教育她说：“你爸爸20余年来是在为人民服务，已成终身职业，而不会如你所想的是在做官，更没有财可发。你爸爸的生活，除享受国家规定之待遇外，一无私有……不能对我有其他依靠。”罗玉英来京之后，遵照父亲意愿，首先刻苦学习文化，毕业后又到郊区的基层农场锻炼，进步很快。

1963年12月16日，罗荣桓因病去世。当天晚上，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开会前，提议大家起立为罗荣桓默哀，并评价他“一个人几十年如一日不容易，原则性强，对党忠诚”。朱德也在悼诗中称赞他是“忠诚革命贯平生”。这是对罗荣桓严于律己、一身正气的高度评价。

## 诗 话

### 锤 声

■刘林青

寄生在阴暗处的虫子  
用细牙啃噬着长城的身躯  
牙齿崩断，仍狂妄、贪婪

钢铁长城用英雄鲜血锻造  
坚硬、纯粹  
不容蛀虫侵蚀

冲锋号已吹响  
历史车轮滚滚向前

一束束灼目之光把阴暗驱散  
蛀虫裸露在阳光下  
反腐的重拳敲击它们的头颅  
如重锤敲击着大地

一锤接着一锤敲  
锤声，也似鼓声，振奋山河  
士气从地表的毛孔升腾  
信仰浇筑的长城  
巍然屹立

列物品都不得随便挪动。指战员都很敬佩吴政委的做法，临走时把庙内收拾得干干净净，众人无不交口称赞。

在进入回民聚居的兴隆镇之前，吴焕先同志深入了解回民地区的社会情况，结合当地回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，及时制定了“三大禁令、四项注意”，对部队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教育，严格要求部队贯彻执行，不得违犯。到了兴隆镇以后，吴焕先又邀请几位颇有名望的人士和清真寺的阿訇到军部做客交谈。他说：“我军进驻兴隆镇，一不向你们派捐款，二不向你们催粮草，三不拉你们的民夫壮丁。大家尽管放心，红军决不骚扰老百姓！”随后，他又讲了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和红军的政策纪律……马青年等六七十个回族子弟，自动参加了红军。“红军好”的消息不胫而走，很快传遍了陇东高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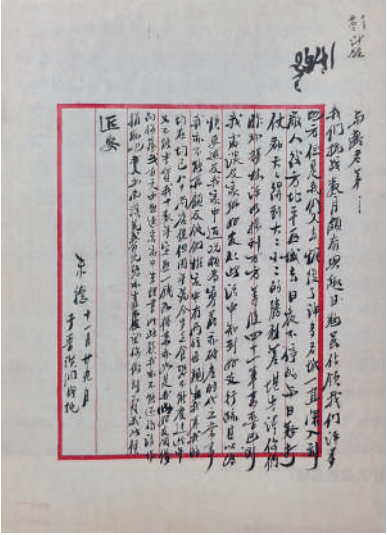
1935年8月21日，在强渡洮河（今泾河）时，吴焕先同志在与敌战斗中，不幸身负重伤、壮烈牺牲。吴焕先同志的英名将与日月同辉，永垂青史！

（文章摘编自《来时路：亲历者讲述红色故事》“胜利到陕北”卷，有删节，原标题为《红二十五军创始人吴焕先》，现标题为编者所拟）

本版学术支持：褚 银

## 档 案

# 朱德的“借款信”



1937年11月29日，朱德写给戴与龄的信。 中央档案馆藏

作为人民军队总司令的朱德，离家一别十余年，家事自然也挂念。全国抗战爆发不久，1937年9月5日，朱德给家里写信，希望家人接到书信后，告诉他家里的情况。同时，他嘱托侄子如果到前线来，需要带些钱来，因为自己没有一文钱。27日，他

## 随 感

世间百态人情暖，万般滋味在心头。权力是有滋味的，观念不同，味道各异。

战争时期，有位西方记者问毛泽东同志：“你们办事，是谁给的权力？”毛泽东回答说：“人民给的。如果不是人民给的，还有谁给呢？”马克思主义权力观，概括起来就是两句话：权为民所赋，权为民所用。

“权力”二字写起来容易，品尝起来却五味杂陈。它像一把双刃剑，善用则利国利民，反之则害人害己；它像一杯白开水，无色无味，至于调出甜味、酸味、苦味，主要是看什么人掌握了权力和怎样使用权力。为公与为私，谋事与谋利，味道迥然。如果立身不忘做人之本、为政不移公仆之心，自然一股“清廉味”；如果斤斤计较于物质利益、苦心孤诣于一己之私，难免一手铜臭味。

心中有民，天下为公。共产党人为了大公、守的是大义、求的是大我。毛泽东同志说得好：“只有把人民的事情办好了，我们共产党人才可以考虑办一办自己的事。如果我们党员队伍中出现了先为自己办事的人，那就毫不客气地把他开除革命队伍去。”

焦裕禄同志任兰考县委书记时，一位亲属拜托他给自己的子安排工作。他不容置辩地说：“国家招工是有计划的，我虽然是县委书记，也不能随便安排人。我有这个能力，但是我没有这个权力！”这句貌似不近人情的话，袒露了多么磊落的内心啊！这样的权力观，发乎本真，行之于外，令人敬佩。

《菜根谭》中讲：“饕餮肥甘非真味，真味只是淡。”做菜讲究“淡出真味”，其实权力也如此。共产党人“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”；权力的滋味，是为人民服务的责任，而非一己一私之快意；是大公无私、先公后私的恢廓大度，而非擅权专断、我行我素的顾盼自雄；是敝裘羸马、力疾从公的担当，而非闭门酣歌、得荫忘身的恣肆……秉持这种权力观的共产党人，恒河沙数，盈千累万，让人民信服。

俗话说：权力是匹野马，如果让它把缰绳叼在自己嘴里，那它什么事都干得出来。权力从来就不是乖巧温顺、循规蹈矩的，天生就有“越位出轨”、腐化变质的风险。腐败的本质是权力滥用。忘记权力的“本味”，权力就会变得疯狂。任由权力“放任自流”，不受约束、不受监督，必然导致泛滥成灾。

小智治事，大智治制。“如果法治的堤坝被冲破了，权力的滥用就会像洪水一样成灾。”习主席以“洪水”喻“滥权”，以“堤坝”喻“法治”，生动诠释法治与权力的关系。贪如火，不遏则燎原；欲如水，不遏则滔天。以科学立法夯实法治堤坝的“规则基石”，以严格执法规范权力激流的“恣意横流”，以完善制度守护法治堤坝的“坚实底线”，让权力受到约

复信给家里，问及儿子、侄子、外甥等人在干什么，要培养他们参加革命，还嘱托说“那些望升官发财之人决不宜来我处，如欲爱国牺牲一切能吃苦耐劳之人，无妨多来”。

不久，其外甥随军队来到山西，朱德得知家里的情况。11月29日，朱德给其儿时好友戴与龄写了一封信。信中说：“家中近况颇为寥落，亦破产时代之常事，我亦不能再顾及他们。惟家中有两位母亲，生我养我的均在，均已八十，尚康健。但因年荒，今岁乏食，恐不能度过此年，又不能告贷。我十数年实无一钱，即将来亦如是。我以好友关系，向你募两百元中币，速寄家中……此款我亦不能还你，请作捐助吧。”

接到这封求助信后，戴与龄即给朱德母亲寄去200元，帮助她们渡过难关。后来戴与龄还多次帮助朱德的亲属，并动员自己的亲属奔赴抗日前线。他相信朱德要走的路和要做的事是正确的。

2016年11月29日，习主席在纪念朱德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讲到这件事时说：“战功赫赫的八路军总司令清贫如此、清廉如此，让人肃然起敬！”

（图文由中央档案馆提供）

# 权力的『本味』是什么

■侯若予

束与监督，才能保持其服务的功能而防止其任性的可能。

南宋学者朱熹在《四书或问》中写道：“天下之难持者莫如心，天下之易染者莫如欲。”规范权力运行，既要靠制度的“外在约束”，更要靠思想的“内在自觉”。一些党员干部之所以沦为“阶下囚”，根本就在于权力观出现了偏差。有些人面对“微利之诱”“五色之惑”，记不清“权从哪来、为谁用权”，做不到“正心明道、怀德自重”，那迟早要失守底线、越过红线、碰触高压线，最终身陷囹圄、身败名裂。

行为产生后果，权力运行也不例外。权力的滋味恶如膏肓，带来的后果大相径庭。成功与失败、荣誉与耻辱、幸福与悲哀，实则只有一步之遥——“只在公私之间尔”。我们每一名党员干部都应深刻认识到：秉公用权，把权力“用对地方”，挣脱的是名缰利锁的束缚，收获的是有理想有质感的人生；依法用权，把权力“用得规范”，超越的是利益算计的狭隘，赢得的是有价值有意义的事业。

无论何时，我们都不应忘记权力的“本味”。时代在变，共产党人的权力观没有改变，也不会改变。广大党员干部应有“自我革命”的勇气、“自我限权”的决心，畏权如用火、慎权如履冰，时时自警、处处自省、事事自律，守住做人、处事、用权的底线，确保手中的权力不变质、不变色、不变味。



重拳反腐（雕塑）

广州市越秀区廉洁文化教育馆供图

# 西征北上途中的吴焕先

■韩先楚 刘 震

## 口 述

1934年冬，红25军奉党中央指示，实行战略转移。在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初期，军长程子华、副军长徐海东在庾家河战斗中均负重伤，军政委吴焕先主持全面工作，独挑重担，为开辟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和红25军的发展壮大，以及粉碎敌人两次重兵“围剿”，作出重大贡献。

他以胸怀全局的革命胆略，坚决果断、及时正确地确定红25军西征北上的战略决策。他具有高尚的革命品质、坚强的斗争意志、卓越的战略远见和领导才能。他作战英勇，身先士卒，临危不惧，指挥若定，在几次生死存亡的恶战中屡建奇功，使部队摆脱困境，转败为胜。

他以身作则，严于律己，密切联系群众，与战士同甘共苦，深为全体指战员所爱戴和敬佩，在部队中享有崇高威信。他善于独立思考，注重斗争实践，对党和革命事业怀有一颗忠贞不渝之心。

西征北上途中，吴焕先同志十分关切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行动的消息，以及川陕甘边的战事动向。打下双石铺以后，他根据敌少将参议的口供和《大公报》上的几则片段消息，认真加以分析研究，及时作出策应红军主力北上的行动决策。据此，他向部队提出“迎接党中央”和“迎接红军主力”的战斗口号，进一步激发了全体指战员的斗志。

从终南山下到陇东高原，吴焕先同志一路上的所作所为都给我们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。部队每经过一地，他都深入调查研究，根据不同地区的民情风俗，适时地提出一些新的政策、纪律规定，并教育

指战员严格遵守，切实做到秋毫无犯。

记得路过留坝县庙台子时，部队住宿在张良庙内，烧火做饭，弄得到处都是柴草烟灰，纪律也不太好。他当即把有关部门同志召集起来，进行批评教育，要求整理好庙内卫生。当时，他听说军供给部把庙内的一对铜鹤收藏了起来，准备带走留作供给经费之用，便立即找供给部领导，让其把铜鹤送回原处。他语重心长地说：“这对铜鹤是很值钱，但它是庙内的文物，再值钱，我们也不能拿走，更不能变卖！”“雁过留声，人过留名”，我们从此路过一回，拿走了留候祠的文物，将会落下个千古骂名。我们红军队伍再穷再苦，都不能做出这种遭人唾骂的事，落下个盗卖文物的罪名！”

他还讲了西汉名士张良的故事，介绍了几块明清两代名人的留题碑刻，要求部队爱护名胜古迹，对庙内的一切陈

